

# 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史研究指明学术方向

王先明

明。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以及由此被迫开启的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革。工业和城市发展前所未有地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自此,乡村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内容。从列强入侵时的乡村凋敝、民不聊生到今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重要篇章。

我国乡村史研究主要关注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乡村基层制度、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乡村社会问题与乡村治理等方面的论题。随着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三农”问题开始备受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问题,更深层次的治理探索和追溯也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我国的乡村史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加自觉的学术关怀呼应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需求,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迈上新征程,乡村史研究要努力实现新发展,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乡村史研究新的时代使命。中国乡村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围绕乡村社会发展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实现新突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学理支撑、贡献学术智慧。

## 乡村史研究成为新时代学术繁荣发展的亮点之一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农耕文

明。只有深入回顾和研究历史,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能认清其时代特征。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秉持强烈的现实关怀,积极围绕“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问题”等彰显现实关怀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体现了学术与时代的密切关联和互相影响。

区域乡村史成果集中,突出问题导向。目前,乡村史研究成果相对集中于华北区域和江南区域,在近代农村社会转型、农村地权演变、农村社会问题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中的宏阔性、总括性论述有所区别,新时代以来乡村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问题导向,在一定的乡村地域内,就乡村人口流动、乡村分层以及乡村治理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路径,比如,在同一历史时期,华北乡村和江南乡村所聚焦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因此,以问题为导向成为区域乡村史研究的基本取向。通过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的呈现和学术解读,可以为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多样性和多面性提供丰富的区域样本,具体地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其特征。

## 推动乡村史研究在新征程上实现新发展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乡村社会历史变迁既从一个侧面深度映射着这一历史性巨变,也以自身独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成就彰显我国道路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创新、文化更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其中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思考和回答,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经验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去总结和提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这一中心任务为乡村史研究指明了学术方向。

做好乡村史与城市史的融通研究。乡村问题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既往的乡村史研究与

城市史研究相对分立、融通不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历程中,努力统筹推进城乡发展。1964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主动顺应世界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的体现,也表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一些国家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根本不同,我们将农业现代化置于“四个现代化”之首,努力推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协同共进、平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旨在跨越城乡对立和工农失衡,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统一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面向未来,要加强学术融合、学科对话,深入推进乡村发展与城市变迁融通研究,这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乡村史研究开辟新领域的必然选择。

深化乡村社会建设研究。在当代史学发展进程中,乡村史研究属于社会史范畴。回顾史学史,对于20世纪前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社会建设特别是乡村社会建设问题,史学界很少将其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对相关内容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附属于乡村建设运动或乡村建设思想研究。近年来,虽有相关主题论文发表,但或侧重于社会学话语体系,或为当代社会建设论题作历史铺陈,鲜有历史学专题研究的深度解析。事实上,从历史学视角系统梳理20世纪以来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深入探讨蕴含其中的乡村社会建设问题,科学而准确地把握这一学术命题的要义,对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突破区域化研究视野的局限。具有区域化取向的乡村史研究使得研究主题更为具体,研究内容更为翔实,在一定意义上深化和细化了相关研究。但也要看到,过度的区域化取向会遮蔽历史学探求总体发展趋向的学术诉求,甚至可能使乡村史研究走向碎片化。乡村社会区域发展中的异质性,无论是江南区域还是华北区域,抑或长江三角洲或珠三角地区,尽管有着不同的发展特征,但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样本。因此,乡村史研究应当突破区域化研究在视野上的局限,在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获得时代性进步。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学术随笔

XUE SHU SUI BI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系统梳理我国现代化的缘起和进程,深入分析其特质和经验,科学把握其发展趋势,努力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学术智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也是史学坚持经世致用的重要体现。

有助于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从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持续探索中总结升华出来的。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思考中国如何向现代转型的问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但甲午战争宣告了地主阶级对现代化探索的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试图从政治制度和思想层面推进现代化,都未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追溯180多年来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恢宏进程,更好展现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让这一理论具有更加深厚历史根基。

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到2035年的总体目标和到本世纪中叶的长远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社会实践。历史是实践的记录,任何伟大实践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同时,任何正在开展的伟大社会实践都需要从历史深处寻找经验、总结教训、探索规律、把握趋势。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就要全面揭示新时代以来我们民族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更好助力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有助于向世界展示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由于西方国家最先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化几乎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然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殖民侵略和残酷掠夺基础上的。世界上一些国家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没能成功,反而陷入困境。大量历史事实证明,现代化不是西方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实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我们要深入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念、宝贵经验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为世界各国人民立足实际、开创未来提供启示,让全人类共享繁荣发展。

对历史最好的礼敬,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新征程上,历史研究工作者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精神,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产出突破性标志性研究成果,提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学术观点,培养一批高层次研究人才,建构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在经世致用上不断展现新作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保障和改善民生须加强制度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简评

黄蓉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韩喜平撰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从教育、就业与收入分配、医疗、养老、住房等具体民生问题出发,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从制度层面研究民生保障与改善问题。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只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才能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该书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制度,在研究框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分析了影响民生改善的具体制约因素,总结了我们党为保障和改善民生而形成的制度成果,既可为民生制度建设相关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也可可为有关部门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提供参考。

新书推荐

XIN SHU PING JIE

## 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

# 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张 焱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交融日益加深,世界中国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为向世界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有效宣介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作出了学术贡献。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提出“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的重要要求。面向未来,世界中国学研究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研究者要更加注重从尊重文明多样性、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视角不断深化研究,进而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贡献更多力量。

随着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与日俱增,世界中国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研究主体看,开展中国学研究的区域不断扩大,南非、巴西、阿根廷等都有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从学术交流平台看,一些聚焦于中国学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媒介,如国外有哈佛中国论坛等,国内有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汉学家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从研究领域看,研究成果更

加精细,如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成立了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研究所。从研究视野看,已经由过去的历史与文献研究拓展到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现实领域。新时代的中国催生新时代的中国学。与过去相比,世界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更加体现全球性,从西方中国学发展到世界中国学。新时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国学正在加速向世界中国学迈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问。在传统的欧美研究重镇之外,巴西、阿根廷、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突尼斯等以往中国学研究比较薄弱的国家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开始聚焦中国开展研究。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继成立了一些中国学研究机构,这些新兴研究力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带来学术新见,为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体现在“跳出中国看中国”。此前,不论是欧洲汉学还是美国中国学,大体都是研究“中国之中国”,或是基于典籍研究中华文明,或是从内部发展来探讨中国道路,或是围绕与中国的双边、多边关系展开论述。新时代以来,一个明显的学术转向就是聚焦“世界之中国”,从全球史、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等维度来理解中华文明、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中国发展的

全球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等都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

更加注重对策性,从传统社科研究拓展到智库研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智库专家逐渐成为各国研究中国的重要群体。尤其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批专家研究本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战略合作以及中国道路对本国发展的现实启示等。这些研究成果很多都直接服务于所在国的政策。被认为是“智库类”的中国学研究,在方法和思维观念上都与传统研究有着显著差异。传统的中国学研究更多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更强调理论的效用;而“智库类”的中国学研究注重解决现实问题,目标读者是政策制定者,更多采用实证性、跨学科和综合性等研究,也就更容易摆脱西方中国学的叙事,更利于从具体的实践中理解现实中国。

更加强调独立性,从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转向更加客观理性研究。传统的中国学研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易以欧美的历史经验为尺度来研究中国。一些研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和西方道路相符的部分就是进步的,反之则是落后的,需要改变的。这些研究在当下已经陷入自洽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专家和各国的年轻一代,不再全盘接受西方研究的既定观点,

对中国的认知更加全面和客观。尤其是“Z世代”正在成为各国攻读中国学相关学位的主力,他们更愿意了解真实的中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后,世界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势,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肯定中国的声音也在不断壮大。

更加注重未来性,从以中国为对象延伸到以中国为方法。中国学在国外是国别区域研究的分支。因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国别区域研究往往能够发现西方正统理论的问题与不足,进而发展出面向未来的新理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新时代的中国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未来转向。这一转向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不再把西方道路当作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唯一路径,不再认为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一些国外学者开始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探索一种面向未来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图景。他们把中国的发展视为推动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可以说,从中国道路探寻本国发展的有益启示,正在成为一些国家的热门议题。不少学者正在通过研究中国来更好地认识自身、理解世界,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洞察未来趋势。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